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廢棄生命的逆行烏托邦	蕭育和	1

〈短篇書評〉

Boris Groys	Going Public	周時晴	13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季治曈	19
Jonathan Martineau	Time, Capitalism, and Alienation	陳旭禛	23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一八年九月 第五十九期

資深編輯顧問 張佑宗、石之瑜

編輯顧問 陳亮宇

主編 蕭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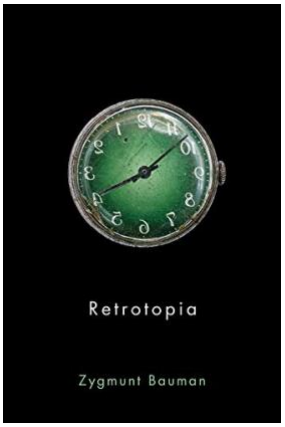
執行編輯 鄭皓中、陳明宗

編輯委員 江俊宜、江俊儒、李天申、陳亮宇、楊尚儒、廖武州、蘇慶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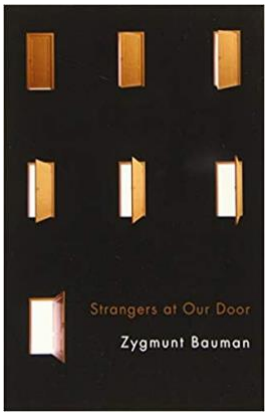
10.6570/PSQBR.2018.59.1

廢棄生命的逆行烏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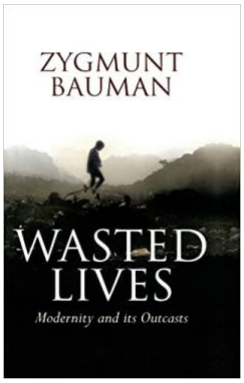
蕭育和 / 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書名：Retrotopia
作者：Zygmunt Bauman
出版者：Polity
年份：2017
頁數：180 pages
ISBN：978-1509515325



書名：Strangers at Our Door
作者：Zygmunt Bauman
出版者：Polity
年份：2016
頁數：120 pages
ISBN：978-1509512171



書名：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作者：Zygmunt Bauman
出版者：Crown
年份：2003
頁數：152 pages
ISBN：978-0745631653

10.6570/PSQBR.2018.59.1

2017 年過世的英國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其生前的最後兩年，出版了兩本新作，分別是《逆托邦》（*Retrotopia*）以及《家門口前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our Door*），可謂包曼的「告別之作」，這兩本著作與他早在 2004 年出版的《廢棄的生命》（*Waste Lives*）是一系列的作品，它們的共同主題就像《廢棄的生命》的副標題所示，是「現代性及其放逐者」（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眾所周知，包曼以現代性的批判而著聞於世，他的「流動現代性」論題影響了我們對於現代性的認知與理解，在這三本著作中，包曼著力的主題是那些在流動的現代性境況中反撲的物事。

在《廢棄的生命》開篇，包曼引用了卡爾維諾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對於李奧納（Leonia）城市居民生活樣貌的描述。李奧納的居民每天享受著最新奇的日常生活物事，最時尚的衣服、全新開封的罐頭與最即時的廣告等等，然後把昨日「過時」的物品，全部打包進垃圾品，僅僅一天，昔日的摩登就會成為廢棄品，等待被清運出生活世界之外。這種生活風格不免讓外地人感覺，李奧納人真正熱衷的不是新奇，而是「驅逐、拋棄與清掃自身反覆出現的不潔」所帶來的樂趣。久而久之，被廢棄的物品開始在城市周遭堆積，這讓居民們深感恐懼，垃圾山的存在讓他們驚覺，廢棄品原來不是像變魔法一樣，會在隔天醒來就神奇地消失？

虛構的李奧納城，是現代性的寫照。整個地球如今就像是一個大型的李奧納城。生活在流動現代性下的現代人，猶如同時生活在兩個城市之中的李奧納人。李奧納人在城鎮中過著流動的現

10.6570/PSQBR.2018.59.1

代生命，沒有一定永續的物事，所有的生命週期不過都是注定預演的無常，今日的時髦是明日的過時，沒有不可替代者，萬事萬物都是「向死而生」，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而如今，這個星球卻為「滿載」（fullness）所苦，但這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滿載，在這個被廢棄物包圍的城市之中，依然維持著最時尚寫意的生活，而其邊界之外的地區，則從「無人所居」的地帶漸漸地轉化成「不宜人居」。所有的廢棄物都能被清理掉，是現代性的夢想之一，曾經，星球承受廢棄物的能力彷彿是無窮無盡。

在包曼看來，人類廢品（human waste）的產生，既是現代化無可避免產物，也是現代性無法分離的伴生。它是秩序建構與經濟進步必然的副作用。在第一波工業化的英國，將不適應新生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失業者、罪犯與懶漢，送往遠方的殖民地墾殖，是通用的政策指南。作為流動現代性的反撲，滿載本質上所指的是，人類廢品處理業的尖銳危機。人類廢品的生產有增無減，又屢攀新高，這個星球面臨的將是廢棄品推積點與廢品循環工具的嚴重匱乏。

李奧納城的意象當然不僅止於物品，被廢棄的人（wasted human）或廢棄的生命也是現代性過程中人形的廢品化身，他們即是全球化過程中的「過剩人口」（superfluous population）。在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眼中，人口的過多固然只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但是它卻指出了一種新品種人的存在，他們的存在無助於經濟平穩運作，他們

10.6570/PSQBR.2018.59.1

無法抑制的增長，只是增加社會的整體支出，卻無法增加任何收益，他們的生產力無法為新生的資本生產秩序所妥善運用，而他們的赤貧狀態更無助於資本所需的消費流通。

包曼所說的「過剩人口」或者「廢棄的生命」。在現代思想對秩序的構思當中，有著所謂「赤裸生命」（Homo Sacer）的說法，它指的是一種在秩序建構中所必要犧牲的生命，為了證成主權至高無上的存在，它必須被排除在成文法律的保護之外，這樣的生命形式固然是可被棄置，但卻有其高貴，他們的犧牲證成了足以護持其他所有生命的秩序，理想的現代秩序是兩者之間完美的互補與平衡。但過剩的人口不是如此，他們只是經濟進步無意的附帶受害者，是貿易、市場需求、競爭壓力、生產力與效率所附屬又不可或缺的角色。

更精確地說，他們是冗餘（redundant）之人。冗餘之人的第一個意涵是，它並沒有類似失業這類語詞所有的背離常態意涵，它沒有異常或異態的暗示，也沒有疾病發作或短暫紕漏的味道，冗餘一詞所暗喻的是一種永遠無法改變的狀態，暗示此一狀態的日常化，冗餘所界定的是這樣一種狀態：無法立即可用。而在無法立即可用之外的另一個意涵則是，他們是可被處理的，或者說已經被妥善處理的，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罐，一次性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汙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

就像李奧納城的居民並不深究垃圾山出現的結構性因素，流動的現代性也

10.6570/PSQBR.2018.59.1

不會或說無法面對冗餘之人的結構性生產：質疑它等於質疑現代李奧納城的生命風格。流動的現代性對冗餘的人口採取使之勉強倖存的社會救濟手段，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無法讓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冗餘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把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並不足以使它盡數成為商品一樣。

現代的政治秩序在兩種迷思之間擺盪，一是秩序的迷思，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政治秩序是一種能把冗餘之人控制在疆界之內的迷思；另一個迷思則是能夠無限處理廢棄品的技術進步迷思。對包曼來說，廢棄生命的常態化是兩個現代秩序迷思碰撞的後果，而它所衍生的後果是一種流動化的恐懼：如果廢棄品的產生已經常態化地無所不在，那麼其所衍生的恐懼自然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如果主權國家的秩序已經無以圈限廢棄物的生產，那麼人們只好好自為之，自食其力，恐懼於是成為我們生活中日益加劇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中，恐懼文化已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這種文化決定性的特徵是，它認為人類面臨著威脅我們日常生活的強大破壞力。

這些都造就了現代主權國家安全思維的轉變。曾經，它的秩序想像以保證徹底消除蔓延的驚恐為正當性訴求，但面對市場所導致的不安全及其廢品生產，當前的主權國家暗自發現，讓這種不安全感持久與加劇，足以成為新的正當性訴求。因此，李奧納城內進步的現代主權透過反覆尋找各種會對個體安全造成威脅的物事，然後，對之擺出

10.6570/PSQBR.2018.59.1

決絕的不讓步態度，諸如犯罪行為所引發的對人身、財產與生活環境的威脅與擔憂，或者草根階級的反社會行為，以及恐怖主義等等。

現代主權國家不再宣稱全面消除恐懼，它們的替代方案是用另一種恐懼代換。與市場引起的對生計與福利的恐懼不同，個體安全危險的程度必須被大肆宣傳與渲染地無比嚴重，把這樣的威脅非物質化就能被吹捧為非凡壯舉，吹捧維國家機器的警惕，關注與善意的後果等等。

包曼生前的最後兩部著作，可以說各自是此一廢棄生命意象的兩面。《門外的陌生人》是對歐洲難民爭論的反思。正如鄂蘭所提示，難民是現代資本主義透過帝國主義政治形式所表現，特有的危機形式。包曼的觀察是，現代國家對於這類生存性危機所採取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手段，也就是藉由過度強調外來「陌生人」對個體安全所造成的威脅，以此代換自己國家人民在資本主義生產秩序中危殆不安的（precarious）具體生活處境。安全化的手法是把人們的焦慮與關注焦點從政府無法（不願意或不積極）應對的那些問題，轉移到人們會在日常生活與無數電視螢幕上所看到的，政府殷切處理，但有時成功有時失敗的問題上。

這個安全化手段是雙重的，一方面，就難民所引致的「安全問題」來說，它本是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運用具體行政與維安舉措應對的，而在「安全化」的把戲之下，如今它被視為各種潛在安全的暗流，具體的安全問題被代換成某種模糊的，無法明確界定的「安全狀態」。正如匈牙利總理 Viktor Orban「所

10.6570/PSQBR.2018.59.1

有的恐怖主義者都是移民」這個宣稱所總結，無法明確界定的安全與恐怖狀態，如今全部壓注在明確的移民人口中。

另一方面，因為流動現代性結構性生產因素所導致，在就業與生活上的具體不安全，則被轉嫁到個體層次上。正如新自由主義擁護者的名言，所謂的「社會」不過想像出來，應對因既有不確定性所導致問題的任務與成本，應當完全由個體來承擔，即便他們的資源明顯不足。一旦結構性的不安定因素成功轉嫁到個體層次上，它就能為「國家安全」所用，再次成為國家誇大安全威脅的資產。在包曼看來，這是現代國家安全治理術的把戲。這個把戲的訣竅是把「移民問題」等同國家與個體安全問題，讓前一個問題歸屬於後一個問題，並藉此最終把前一個問題化約成後一個問題，

包曼另外關注的是此一安全化手段的道德效應。安全化的治理手段區分出處於瀕危狀態的「我們」，以及作為威脅根源的「他們」。當前的移民政策鞏固了越來越僵固化的兩大世界性人口類型之間的分割，一類人屬於乾淨、健康且明亮的世界；另一類人則是剩下來的「多餘」(remnants)，屬於黑暗、致病與黯淡的世界，要是現狀不變，同樣如鄂蘭在上個世紀的預言，難民營將不會再用以護持脆弱的難民，而是用以集中安置與戒護各種不想要(undesirable)的人口。對安全的狂熱要求外來者必須「自證安全」，由治理術所縝密安排的安全狂熱，只關注難

10.6570/PSQBR.2018.59.1

民悲劇的犧牲者，卻不關注其悲劇命運的全球根源。

我們與他們彼此之間別無共同承擔的命運，無視於造就彼此不安命運結構性因素的後果，既是無止境的恐懼，也是沒有下限的道德冷漠。因為那些難民與外來者，是需要透過維安手段收束其潛在威脅的「門外陌生人」，這讓我們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去道德化，抑制我們在面對他們處於安全化策略時，所產生的內疚感。

如同教宗 Francis 在 2013 年 7 月 8 日，造訪地中海的 Lampedusa 時所說「在今天的世界中，我們沒了個體責任感，我們已經對我們的姊妹弟兄，失去了責任感…只求個人安逸舒適的文化，讓我們只顧自己，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吶喊，麻木不仁，讓我們生活在肥皂泡泡，可是無論泡泡多綺麗，都是虛幻的…我們已經陷入全球化的冷漠狀態，日益習慣對他人的苦難熟視無睹」。

於是，那些為了逃避恐怖主義，而從海上逃難而來的人們，他們所經歷的人間悲劇，如今正被刻薄起訴的命運，以及深溝高壘的修建等等，現在全部都為「這些難民要來殺死我們」的恐懼所掩蓋與抹殺。難民的生存困境，並未激起我們的同情與共感意志，反倒是而是成為某種布萊希特所說「壞消息的預兆」提醒我們，我們自己的地位是多容易受到影響與傷害，甚至是受到無可治癒的傷害，我們千辛萬苦得到的幸福安寧，是如何地顯得脆弱。

正如包曼所引用，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我們就像被青蛙救贖的野兔，皇逃跑到湖邊的野兔，本來決定乾脆投湖自

10.6570/PSQBR.2018.59.1

盡，可是看到湖邊的青蛙一個個驚恐下水，於是自我安慰，原來也還有動物怕我們野兔，這個故事所蘊含的倫理意涵是，只要還有人的命運比自己更糟糕，那麼自己就會感到一絲安慰，日常遭受的迫害與苦難，以及因此導致的心灰意懶，意志消沉，也會因此一掃而空。

對包曼來說，由門外陌生人這類廢棄生命以及相應的安全化政治應對，是理解當前西方國家中右翼民粹與種族民族主義崛起的重要脈絡，此即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逆托邦》所關注的主題。它反映了當前烏托邦想望形式的根本轉變，曾經，烏托邦的想望期待是各種進步的實現，我們反覆將目光投向更遙遠的地平線，但在當前的世界，我們卻無從想望烏托邦，我們已經無法想像一個比我們已獲有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不只是因為當前的世界殘破，更是因為我們默認「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已是虛幻的泡沫，即便政客依然信誓旦旦地保證。作為李奧納城中被廢棄品圍困的居民，我們已經很清楚「無休止進步」的看法或願景，所預示的卻是失去的危機，而不是在這個世界實現往上的流動，進步現在更多是跟社會惡化相關，而不是與改善與提昇相關。因此，我們只能與這個殘破的世界共存，對未來的期待只剩下卡夫卡所說的「我只是想出去，就是想出去」的低微呻吟。過去，公眾從原先十分關注減少世界的不確定性，希望改變未來那明顯的無法信任，轉而把希望寄託在他們依稀記得的過去，他們認為穩定，可以信任而有價值的過去。

10.6570/PSQBR.2018.59.1

這是烏托邦思想的當代變體，包曼稱之為「逆托邦」。它的特徵是，首先，逆托邦依然保留了認可某種未來的願景，但是此一願景是由懷舊的情緒所構成。人們已無力大膽構思各種消除苦難根源的大規模方案，於是用記憶中美好懷舊的過去片段，拼湊出美好生活的想望。在班雅明對「歷史天使」的解釋，歷史的天使對歷史苦難無能為力，只能任其堆疊，而進步的風暴將之吹起，推向天使所背對的未來。逆托邦的景致是倒過來的，這次的風暴從人們不再抱持希望，憂慮的未來吹來，逆托邦的天使急切地收拾那些歷史的堆疊，渴望從這些碎片化的過去片段中，拼湊出一個美好的未來。

逆托邦的第二個特徵是希望的私有化（the privation of hope），把社會更大的期望與責任，轉移到我們個人自己的小宇宙，在上一個世代，我們還沒有失去所有的希望，還有未來我們會更好的希望，而現在，希望越來越私人化，出現了各種極為大量的個體化希望，但卻不再設想關乎整個共同體的希望。烏托邦的希望本質上是建立在共同體的彼此之間，只有「我們」而沒有「我們與他們」，希望的私有化把所有想望未來的動力都化約到個體的生命與身體之上，逆托邦的道德律令是「回歸自我」，它不再共同居有，從或近或遠的「就在那裡」(他者、共同體、人類、我們共有的行星)汲取倫理互動法則，而是從我機會主義的身體中自取，我的靈活權變，實現良好狀態的能力等等。

某種意義上，逆托邦認可了「反烏托邦」的原則，它珍視那些「曾經有用」的政治社會方案，對於大膽的進步構思抱

10.6570/PSQBR.2018.59.1

持懷疑態度，因此也就拋棄了無休止不斷變革的理念，就像保守主義者的心態，他們信仰那些傳統留下的價值，但也不同於開明的保守主義者，逆托邦意圖在一個已經不再如是的世界中，重新救贖過去。

對包曼來說，當前各種看似匪夷所思的現象，其實都是逆托邦思維的反映。民粹強人的崛起是整個共同體在失去集體性連結之後，個體透過與政治強人在情感上的連結，維持自己依然在這個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不被未來的潮流拋棄的垂死掙扎。逆托邦也構成了全球恐怖主義攻擊的精神地緣政治，青年男女大多不是出於意識形態狂熱或者反抗極權主義壓迫而委身自殺式恐怖攻擊，而是出於嚴酷的生存狀況與日益黯淡的生活前景。恐怖攻擊事實上是一種在生與死、世代之間的絕對倫理關係，在其中，過剩的廢棄生命，在無視於資本與國家現實原則中，得到昇華。

包曼曾經說，他做社會學的指導原則是卡謬的這句話，「此處既有光鮮亮麗，也有委屈受辱。無論此番冒險事業給出什麼難題，我都不會羞於面對前後任一者。」在包曼這個「現代性及其放逐者」的三部曲中，廢棄生命的形象並不是單一的，就像李奧納城與其周遭的垃圾山，廢棄的生命以兩種極端卻又並存的雙生樣態並存，這是流動的現代性與全球化的後果，也是現代性迷夢的終極反彈。包曼的書寫沒有兀立體系的理論意圖，其更像是娓娓道來的敘事，卻每每發人省思。

10.6570/PSQBR.2018.59.2

Going Public

Boris Groys

周時晴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書名：Going Public
作者：Boris Groys
出版者：Sternberg Press
年份：2010
頁數：168 pages
ISBN：978-1934105306

Boris Groys 在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頗具顛覆性的觀點，他認為，史達林時代的蘇維埃「整體藝術」觀點，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前衛派（或作「先鋒派」）的藝術觀點。對前衛派來說，他們反對「為藝術而藝術」這種貧乏的藝術觀點，如果哲學的目的不在於解釋世界，而在於改變世界，那麼，同樣的，藝術的目的也不在於表述這個世界，而在於改變這個世界。

藝術必須擔負改變世界的政治責任，藝術與政治不能分開。對 Groys 來說，史達林主義的整體藝術觀，繼受了前衛派這個觀點，如他所說「在史達林治下，前衛派事實上美夢成真，整個社會的生命以一種單調的藝術形式組織起來」，儘管「這不是前衛派原先設想的那樣」。

前衛派與史達林主義對於藝術的立場並沒有分別，Groys 這個立論突顯了他對「藝術作為一種人的活動場域」當前境況的批判性診斷。Groys 所要批判的是當前對藝術的一個主流觀點（特

10.6570/PSQBR.2018.59.2

別是當代藝術），這個帶有前衛派思想的主流觀點認定，必須把藝術從一個有所限定的美感鑑賞與品味空間中抽離出來，讓它走出藝術家小圈圈的同溫層，藝術必須「民主化」，需要對之「聖像破除」（iconoclastic），讓藝術走入生活，在某種意義上，藝術就擔負了「改變世界」的「政治」使命。

對 Groys 來說，當代藝術的頹勢事實上來自於藝術生產的「詩藝化」，導致了藝術的經驗，一方面在作者一邊形成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另一方面在觀者一邊形成孤立的「為觀賞而觀賞」，藝術的經驗與生產完全失去了其原先作為作者與觀者之間共感空間的「美學」要素。

在當前的藝術經驗中，藝術「品」孤立地「為展示而展示」，藝術的作者透過這樣的展示完成其自我同樣「純粹」的展現，而觀者佇立在展示面前，孤立地「品味」藝術，不再有作者與觀者之區分及其所衍生的「共同空間」，只有作者與觀者各自孤立的「體驗」。Groys 指出，這個「從美學到詩藝」的進程，事實上也是前衛派的立場，如他所說：

（前衛派）生產了媒體敘事，他們通過為媒體撰文、教書、著述、表演與圖像生產，展現藝術的公眾虛擬形象…然而，與其把他們的藝術實踐看作從美學到詩藝的轉變，更確切地說，**是從美學到自體詩藝（autopoetics），到公共自我展現的轉變，似乎更為合理**。（”Introduction: poetic vs aesthetics”）

10.6570/PSQBR.2018.59.2

「觀者的消失」，或者更精確地說，「作者與觀者的無以分別」是理解 Groys 對當前藝術境況的重要線索。據此才能理解 Groys 對所有「藝術走入生活」呼籲的質疑，例如，如果嘗試讓藝術走出類似美術館的具體建制，最終的結果不免會是加劇本來對美術館的批判：美術館的展示成為純粹的展示，這是為什麼 Groys 會說，「越是嘗試掙脫美術館的束縛而得到自由，就越是以最基進的方式受制於美術館的收藏邏輯」（"On the new”）。意圖拆解藝術美學鑑賞「有所限」的建制空間，最後的結果都是讓藝術失去其本具有的顛覆性力量，如 Groys 所說：

在品味是由當代媒體生產的背景下，號召大家摒棄並拆除作為一個機構的美術館，其意義與前衛時代完全不同。當人們說到「真實生活」，通常他們指的是全球媒體市場。這表示：**對美術館的抗議，不再是以美學平等為名，或者對正統品味的抗爭，相反，是意圖穩定與確立目前盛行的品味。**（"The politics of equal aesthetic rights”）

Groys 對當前藝術生產機制的討論，也是沿著這個線索開展。藝術家在當前的藝術生產，被認為具有至高主宰的自由，而策展人則扮演詮釋這個至高「主權」，為之設立出「制度性自由」的美學空間，其政治性效應是完全瓦解作者與觀者共同構成的美學鑑賞共感空間，把觀者化約成孤立的觀者，Groys 這麼說：

典型的展覽讓每個觀眾變得孤單，但同時允許他單獨面對與思考藝術品。

10.6570/PSQBR.2018.59.2

從這個作品到那個作品，這類展覽中的觀眾得要忽略整體的展覽空間，包括其自身在這個空間中所在的位置。可是相反，**正是因為（藝術）部署空間的整體性與一致性，它才能夠建立一個觀眾群體。真正藝術部署的觀眾絕對不會是形單影隻的，而是一個觀者的集合**。而像上述的藝術空間，只能被大量的觀眾所觀看，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被一種群氓大眾（multitude）所觀看。大眾正在變成每個單獨觀眾所舉辦展覽的一部分，反之亦然。（"Politics of installation”）

對 Groys 來說，藝術的作用是「讓所忽略的現實變得可見」，藝術家「用一種非常直接的方式為部署空間的設計擔負美學責任」，因此，他就得以「揭露當代民主秩序中所隱藏，各種政治策略大力意圖遮掩的自主性面向」（"Politics of installation”）。Groys 的立場是，必須重新界定（最低限度的）作者與觀者之別，才能挽救「觀者的消失」的命運，而不是把美學平等的邏輯推到極致，後者不過重新鞏固市場邏輯，全無新意可言：

後現代的品味一點也不像它表面上那麼寬容…它確實拒斥了一切普遍、一致性與重複性…的東西…後現代的感官極為厭惡共產主義黯淡、單調與毫無啟發性的外貌…共產主義的美學跟主流的多元美學對著幹，後現代的品味跟它普遍性與一致化的他者對著幹…可是如果問這種主流後現代美學繽紛多元的起源何在？…它不過當代市場所形構的品味，市場的品味。（The Art Power, pp.150-151）

10.6570/PSQBR.2018.59.2

「觀者的消失」，及其導致的「共感空間的消滅」，此一當前藝術的命運，事實上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康德美學思想的兩面性，既相信品味鑑賞所具有的公共性（如鄂蘭對康德的詮釋），另一方面，康德又如 Groys 所說，主張美學的經驗可以擺脫藝術的具體化形式，而純粹化成「道在屎溺」，則日常生活即便屎溺亦有美學生產可能的純粹「詩藝」創作。

後者特別體現在前衛派「弱勢」(weak) 的藝術策略：透過「減去」藝術圖像的具體時代內涵，將之化約成符號：只有純粹的圖像、色彩與框架，最經典的例子即是 Groys 反覆提及的馬列維奇的「黑色方塊」。既然藝術的圖像並不承載任何具體的時代內涵，它作為一種「弱勢」的符號，就取得超越時代與地域限制的「普遍性」，一個沒有經驗內涵，超驗性的符號，就具有無限重復的可能與契機，這麼一來，不只原創與副本的區別消失了，藝術家的身份也失去了特殊性，它不過是提供一些作為圖像的純粹符號，公眾藉此可以重新去連結符號與內涵。也就是說，藝術要成為某一種可以流通的符號，它才真正「走下神壇」，走入日常生活。這是 Groys 為何將弱勢策略與救主彌賽亞連結的主因，如他所說：

就一種彌賽亞式的凝視來說，（這個黑塊）已經是一個黑塊了。這就讓前衛藝術真正得以向一種普遍，民主的藝術敞開來，可是前衛藝術這種普遍化的力量，是一種弱勢，自我消解的力量，因為唯有前衛藝術生產出盡可能弱勢的圖像時，它才能取得普遍的成功。（”weak universalism”）

10.6570/PSQBR.2018.59.2

「弱勢普遍主義」是 Groys 對當前藝術生產中「平等邏輯極致化」的總結，背後蘊含了諸如作者的至高化、觀者的消失以及藝術與政治另類的結合等等 Groys 對前衛藝術構思的批判。在 Introduction to Antiphilosophy 一書中的 A genealogy of participatory art 一文中，Groys 提出了另一種藝術美學空間的策略，這主要是援引華格納對「整體的藝術作品」（total artwork; *Gesamtkunstwerk*），其構思主要在於肯定藝術作者有限的自主性，同時要求作者必須捨棄「詩意」的「自我論」（egoism），藝術的生產在這個意義上是特定共同體與文化的具現，如華格納所說：

甚至天賦聰慧的創作者，也不是真正的創作者，民族（Folk）才是，若是缺了它，就無創作可能。**所有偉大創作都是人民的偉業**（deed），知識分子的構思不過都是民族偉大創作的探索與衍生，不僅如此，也不過就是民族偉大創作的碎料與變形。（轉引自 Introduction to Antiphilosophy, p.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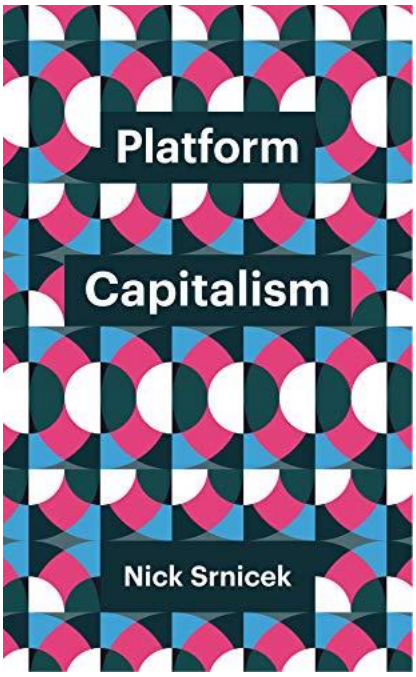
Groys 對華格納的援引，藉此提出「參與式藝術」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能挽救當前藝術生產「觀者的消失」的困境？或許是值得關注當代藝術解放潛力可以關注與深思的。

10.6570/PSQBR.2018.59.3

Platform Capitalism

Nick Srnicek

季冶瞳 /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書名：Platform Capitalism
作者：Nick Srnicek
出版者：Polity
年份：2016
頁數：120 pages
ISBN：978-1509504879

「平台」的出現，可以說是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徵，Nick Srnicek 的《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一書，所討論的就是這個主題。該書將平台的出現放在戰後資本主義生產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因此，主導平台的科技公司，就不只是新創事業或文化的領頭，更重要的是，它們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的經濟行動者，同樣被迫尋求利潤的抵禦競爭。

該書的基本論點是，伴隨戰後全球製造業盈利能力長期的持續下滑，為了應對生產領域的低迷，資本主義的生產開始轉向數據，並以之作為維持經濟增長與企業活力的方式。到了 21 世紀，在數位科技長足進展的基礎上，數據越來越成為企業及其員工、客戶與其他資本家關係的核心。能夠提取與擁有大量數據的平台，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

該書認為，「平台」概念的興起，始於戰後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為盈利下降之故，開始降低勞動力面向上的支

10.6570/PSQBR.2018.59.3

出，打擊工會與將工作外包化，都是具體的做法。而早期的外包工作所包含的是可運輸的貨品，如小型消費品，而非不包括非貿易的服務如管理，與非貿易性的貨品如房屋。但在 20 世紀 90 年代，訊息與通訊技術讓這類的服務得以外包，相關的區別是需要面對面接觸的服務，例如理髮與護理等工作，與非個人性的服務，例如數據輸入，客戶服務與放射科醫師等的區別。前者在可能的狀況下在國內被外包，而後者則日益受到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壓力。

70 年代開始，由於網路基礎建設的長足進步，加速了 70 年代開始的外包趨勢，隨著全球通信與供應鏈的建構與經營，外包變得越來越容易，協調成本大大降低。公司將越來越多的組件向外推，Nike 就是這類精實 (lean) 企業的象徵：高收入經濟體負責品牌與設計經營，而製造與組裝任務，則外包給低收入經濟體的血汗工廠。

外包的常態化讓企業得以以「精實」模式，保持核心競爭優勢，並隨時脫手不盈利的部門，這個模式卻也因為外包的崛起，而受到挑戰，重要的變化在於數據的角色產生了改變。在 21 世紀，發達資本主義的發展重心，就在於提取與使用一種特別的原物料，也就是數據。作者首先提醒，數據並不是「非物質性」的，數據的蒐集與分析不是毫無阻力或者自動化的過程，大部分的數據必須要整理並組織進標準化的格式才能使用，也就是說，今天數據的蒐集有賴於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進行感應、記錄並分析，數據中心的耗電如今已佔全球用電量的 10%，足見其消耗程度。

10.6570/PSQBR.2018.59.3

數據已經為一些關鍵的資本主義功能提供服務：它們訓練並賦予計算程序競爭優勢；能夠協調與外包給工人；讓生產過程優化與靈活；將利潤降低的貨物轉化成高利潤的服務；而數據本身又生成數據，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鑑於記錄與使用數據的顯著優勢，以及資本主義的競爭壓力，這種原材料無不避免將會代表一種有待提取的巨大新資源。對本書來說，平台是連結數據與舊有商業模式的企業新形式，平台通常由處理數據的內部需求誕生，並成唯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獨佔、提取、分析與使用所記錄下來，日與俱增的數據量。

平台的第一個特徵在於，它是數位化的基礎設施，讓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群體能夠進行互動。平台不是從根本上建立一個市場，而是提供基礎設施來調解不同的群體。它比傳統商業模式更有優勢的關鍵在於數據方面的優勢，因為一是平台的定位在用戶之間，二是平台是用戶活動發生的基礎，從而使其有權記錄其探訪。

再者，數位平台的生產，有賴於「網絡效應」，這意味著平台得要採取一系列方法，確保越來越多用戶加入，由於用戶群與不同平台之間的複雜關係，平台企業無法以維持核心競爭力，並出售不盈利企業的「精實模式」進行營運，事實上，並無法知道怎樣的平台與數據蒐集能夠在未來「具有核心競爭力」，因此，它們採取了交叉補貼（cross-subsidisation）的經營模式，總而言之，平台是一種新型的公司。其特徵是提供基礎設施，以調解不同用戶組，顯示了由網絡效應驅動

10.6570/PSQBR.2018.59.3

的壟斷傾向，運用交叉補貼來吸引不同的用戶組以及利用設計好的核心架構，控制互動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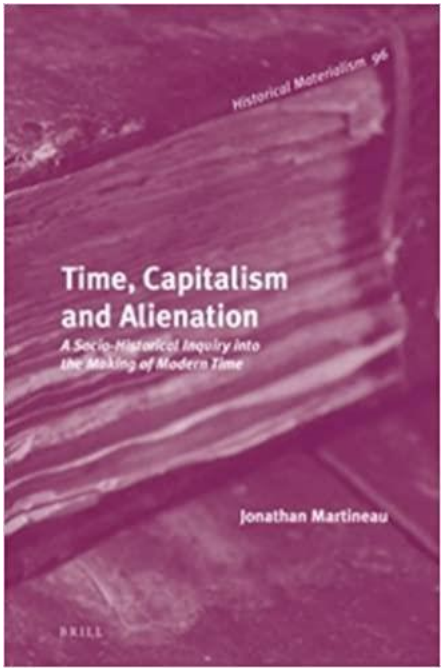
該書關注平台商業模式興起的資本主義脈絡，也關注平台模式對現有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衝擊。作者特別強調，平台作為中介，不僅可以獲得更多數據，還可以控制與管理遊戲規則，而且固定規則的核心架構，也具有不同的生成能力，讓其他人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以其為基礎建構平台。平台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藉由引入數據這個新角色，它也構成了新的生態系。本書認為平台是資本主義汲取數據此一原物料的重要工具，平台的發展有其資本主義生產脈絡，其成形與主流化，也對資本主義造成了衝擊，這是這本小書，非常重要的貢獻。

10.6570/PSQBR.2018.59.4

Time, Capitalism, and Alienation

Jonathan Martineau

陳旭禛 /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助理



書名：Time, Capitalism, and Alienation
作者：Jonathan Martineau
出版者：Brill
年份：2015
頁數：192 pages
ISBN：978-9004249738

在《時間、資本主義與異化》（*Time, Capitalism, and Alienation: A Socio-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Making of Modern Time*）一書中，Jonathan Martineau 對現代世界是如何把時間理解成一種外在且自然，而我們都不免臣服與對之反抗的力量，提出了細膩複雜的分析。他結合時間研究的幾個重要的理論作品，並關注把資本主義與分秒精確的「時鐘時間」連結在一起的歷史社會因素。

其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於「異化」這個馬克思式概念的闡述。Martineau 把「具體」（concrete）與「抽象」（abstract）時間對立起來。前者是鑲嵌在商品的使用價值生產中的時間性節奏與過程，後者則是量化的時間單元，用作勞動力的衡量，並伴隨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擴展開來。也就是說，當抽象時間把市場價格機制與勞動力自身連結在一起時，它就深刻地鑲嵌在資本主義的價值形構中了。

抽象時間與勞動力的相融，強化了工人與其勞動，與其生產，與其他人，與其自身的異化關係，這個相融讓工

10.6570/PSQBR.2018.59.4

人不得不從屬於基於分秒精確時鐘時間的生產標準。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抽象時間就像一條軸線貫穿價值的形構與挪佔，這種抽象時間既與人疏離，也「物化」成自己的樣子，並據說具有自己的力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傾向把時間看作外在現象，看做一個物，獨立於人的生命、意志與行動而運作。

具體與抽象時間之分，用語得自馬克思，而其架構無疑得自 Nobert Elias 知名的〈論時間〉一文。Elias 認為，無論是將時間視為客觀事實或者視為一切可能經驗的體驗形式，都忽略了時間社會性面向的脈絡。他強調，過去對時間的構想，都是以特定的社群為基礎，直到近現代，時間這個受到人為加工或標準化的「自然過程」，才成為抽象調節社會節奏的手段。對 Elias 來說，這就意外碰到一個典型的社會學問題：從人類的共同生活中，產生了某種他們無法了解，顯得玄奧神秘的事物。

Martineau 對於 Elias 思想的繼受清楚可見。這可以從對比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時間性關係中得到闡述。Martineau 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近現代歐洲的時鐘時間。他指出，早期歐洲存在著不同且相互競爭的時間體系，教會的末世觀時間以及農業生活中生生不息的循環時間等等，而時鐘時間，則是早期的資本主義貿易商與生產者所認定並依據的時間體系。當封建主義逐漸轉型為資本主義時，孤立於社群的時鐘時間，就結合一個新的時間性底層建築，伴隨著商業貿易而擴展開來，諸如公共的大時鐘或者新的勞動體制等等。在思想上，其對稱

10.6570/PSQBR.2018.59.4

就是牛頓宣稱時間是超乎人控制的現象。

接著，Martineau 指出，勞動力的商品化，及其在產業資本主義中相伴相生的規訓與壓迫性制度，證明了時鐘時間的深化與散播有其必要。而這個時鐘時間的全球性標準化，直到英美的鐵路公司，在建立有效與統一的守時體系，通過世界標準時間把市場與國家連結起來，而告完成。Martineau 認為，抽象時鐘時間的全球化不單純只有理性化這個面向，同時也依附在堪稱資本主義特色的異化性社會關係中。

Martineau 認為，抽象時間的散佈與擴展，不等同其「普遍化」。他強調，抽象時間與具體時間之間存在著一個無法消解的辯證性關係，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為數不少的在地團體，反覆地透過具體時間的時間性現實，來挑戰抽象時間的標準化。不過，他也指出，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抽象時間具有一種霸權化的趨勢，但 Martineau 所指的「霸權化」究竟為何？是多過理論性闡述的修辭效果嗎？Martineau 這點並沒有談得很清楚。

在 Martineau 的闡述中，「霸權化」所指的某個面向是在推進全球標準時間時，技術型「知識分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這些標準化的作業，無疑必待一批具有專業知識，能將各種具體時間抽象化的技術人力。但是，嚴格來說，若是 Martineau 堅持抽象時間與具體時間之間的存在著無法消解的辯證性對抗關係，那麼，強調此一關係的異質化程度，可能遠比強調其霸權化面向更為重要。在某些工時對抗

10.6570/PSQBR.2018.59.4

中，具體時間的現實時間節奏，會壓過抽象時間的標準化傾向，例如，醫院場域的工時對抗。

這同時也指出了另一個更重要的理論問題：基於具體時間的現實時間節奏的工時主張，並不必然就具有進步要素。特別是在後泰勒主義的產業社會中，「謹守時鐘時間」的資本主義戒律已經被彈性化的主張所取代，從這個角度看來，時鐘時間與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關係，恐怕遠比 Martineau 所構想的來得複雜。

【政治科學季評長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一) 短篇書評：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截稿日期：長期徵稿

■ 稿件筆潤：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注意事項

(一)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二)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三)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四)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